

一生一首翰墨诗

海上谈艺录

周慧珺

李静 张亚圣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周 一生一首翰墨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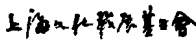
李静 张亚圣 著

四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一生一首翰墨诗 / 李静, 张亚圣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5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624-1
I. ①—…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周慧珏—评传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6872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邹 平 王 刚

责任编辑 陶 晨 张 原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一生一首翰墨诗
著 者 李静 张亚圣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624-1 / J.374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艺术访谈

舞墨人生	(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髫稚之年	(17)
第二章 求学生涯	(23)
第三章 翰墨旅途	(31)
第四章 悲情文革	(41)
第五章 良师益友	(58)
第六章 百废待兴	(70)
第七章 转益多师	(80)
第八章 名人交往	(97)
第九章 多姿生活	(114)
第十章 游历五方	(128)
第十一章 忘年之交	(147)
第十二章 书坛盟主	(155)
第十三章 尾声	(176)

附录

从艺大事记	(181)
后 记	(190)

艺术访谈



雅与俗是一种形态。书法艺术不是一体性的，它具有多元性、融合性，而“中和”才是极致。它集宇宙之大成，静中寓动，犹如天空，看似湛蓝，其实包含了所有的色彩。

——周慧珺



周慧珺（中）与李静（右）、张亚圣（左）合影

舞墨人生

时间·2010年1月

地点·周慧珺寓所

采访人·张亚圣

被采访人·周慧珺

新年伊始，姨妈李静打来电话，说是要让我去对周慧珺先生进行采访，作为上海市文联主编《海上谈艺录·周慧珺》的前序部分。她与周先生几十年朝夕相处，俨然家人一般，由她采访周先生总感觉有些滑稽。想来我是采访的合适人选，因而邀我赴约。我欣然应允，信手写了一些问题，随即起身前往。

周慧珺先生的寓所离我住处仅一街之隔，未及家门，周先生已经迎立门外，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实际上，周先生的住所我绝非初次踏足，自懂事起就与周先生熟稔，每次先生都是如此热情。我幼时总跟着母亲到周府拜访，因而每每口唤周先生为“小外婆”，很是亲切。放眼居室客厅，面积不大，却很精致，富有格调。满壁满墙都是文友墨客的字画，如老前辈吴湖帆的山水画、赵之谦的书法及朱屺瞻、程十发、张桂铭等的墨迹，无不瑰丽典雅、笔势飞动。一排红木多宝格上还有她早些年究心收藏的文房雅玩，犹以古砚为多。当然，书房内少不了大宗的古籍书策，以供其学养。

认识周慧珺的人都知道，先生历来深居简出，一来是她腿脚不便，二来是其不善言辞的性格使然，担任了书协主席后，才多了应酬。不过，除了书协举办的展览、比赛及社会公益慈善之外，她依旧能不迈步就不迈步，对于采访或是邀约更是态度决绝，总以“我只是写写字，真的没啥值得采访的呀”之类理由婉拒。苦了那些记者，吃了不少闭门羹，尤其是电视台几次要为先生摄制专题片，概被推托，先生的低调严谨可见一斑。

回忆往昔，先生自髫龄与书法结缘，二十多岁时即已崭露头角，三十五岁时出版了平生的第一本字帖——《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一时间大江南北从者如流，

刊布发行量达数百万之巨。此时先生的行笔俨然帖学正宗，却丝毫未沾染明清以来帖学柔媚、纤弱的流弊。中年后又汲蓄北魏碑版、汉简木牘之养份，上溯晋唐，下及明清，众长博采，终创新格。其结构寓方于圆，布白疏密有致，行笔多取逆势，杀锋入纸，极具八面出锋之变。《人民日报》刊文曾赞叹其书：“通篇风骨挺健，慨然有丈夫气，与所书文辞堪称妙合无间，令读者回肠荡气，发慷慨轩昂之想！”

而今，先生已然七十有一矣。

来之前，我还在为如何起讲发愁，没想到先生兴致很高，端来茶水果品后，躺在沙发上，好似待我发问。之所以说是躺坐，还是因为周先生一生缠疾，病魔追身。由此，话题就以先生的身体近况开始……

张亚圣（以下简称张）：周先生一生受类风湿关节炎所苦，不知近况如何，这是读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周慧珺（以下简称周）：我的类风湿关节炎是老毛病了，也不知是不是家庭遗传（周慧珺的大哥、二姐、三姐也患有类似疾病——作者注），怎么治也治不好。早年试过一些药方，都没见什么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得已请瑞金医院的杨庆铭医生对右髋关节进行了人工置换手术，总算有了些许好转。到了2003年，病情有些反复，于是又对右膝关节、左膝关节和髌关节进行了手术。

这两年虽然起立行走仍旧感到不便，但至少可以四处活动。我也趁此机会到祖国各地游历了一番，去了山西、云南、四川，远点的还去了日本和欧洲。借今天这个采访的机会，我要感谢很多读者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厚爱。

张：先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镇海人，原本在家务农，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来到上海创业的呢？

周：从古到今，我们镇海人都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什么虞洽卿、叶澄衷，都是赫赫有名的商人呐。那时的上海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嘛，自然是商贾云集。1904年的时候，我祖父先到了上海，在亲戚家的一间五金店铺帮忙。后来又将家父接了过来，两人起早贪黑了好些年，攒了些钱，就在南市新开河一带盘了间店铺，取名“义昌号”。再后来，生意越做越好，就迁到了北京东路上。

张：这个“义昌号”就是现在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吧？

周：对。1956年经历了公私合营，后来又和其他几家五金店合并，成了现在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

张：哦，我看见这里墙壁上挂了一幅画，很显眼，好像是吴湖帆的吧？

周：对，吴先生的《赵松雪林塘晚归图》，是家父的收藏。

张：据我所知，您的父亲有收藏书画的嗜好。一个商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雅好，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周：家父自幼就喜欢写写画画，后来家境好了，就动了收藏的主意。没事就跑当时被称作“古玩一条街”的五马路，淘碑帖、古董，收了不少好东西。“四王”的、恽寿平的、郑板桥的、华新罗的、“三吴一冯”的、张大千的，都有。特别是扇面，尤其多。时间久了么，就认识了很多圈里的朋友。吴先生是其中之一，还有冯超然、江寒汀、庞元济。

张：那现在这些收藏呢？

周：文革时大多被抄了。这幅《晚归图》也是因为在红木镜框的玻璃上边糊上红纸，再在上面书写了毛主席语录挂在墙上，才幸免于难的。

张：您在《书道苦旅》中先生曾提过，自己走上书法这条道路也是受了您父亲喜好书画的影响。

周：是的，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一直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做生意是肮脏的，搞书画是清白的”，因而从小就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练习写字，甚至定下日课。我打小目光所接触到的就是满屋的书画挂轴，算是对我学习书法的启蒙吧。家父本意是让我学赵字的，漂亮嘛，将来出去做人做事体面。

张：那后来怎么托迹于米芾了呢？

周：那时候年纪小，贪玩，也就是顺着父亲的意思练啊练，依样画瓢罢了。后来，在我大哥那找到了一本米南宫的《蜀素帖》，突然间就被吸引了。于是，练了好些年的米字。后来写了幅《蜀素帖》，没想到上了《新民晚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家父更是高兴，给许多亲戚朋友打电话报喜。

张：我们知道，米芾的书风跌宕取势，一泻千里，有“刷字”的美誉，是不是这吸引了您？

周：不完全是，我觉得这还是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喜欢刚强的一路。不过也正因为临的那幅《蜀素帖》登上了报纸，我才能进入青年宫书法班，和书法结缘啊。

张：说到青年官书法班，现今很多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都是当年的学员，难道青年官教学水平真的那么高？

周：那是当然，青年官的老师都是名家，沈尹默、拱德邻、翁闾运、白蕉、任政、胡问遂，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而且那时的老师是有多少讲多少，从不藏着掖着，是真心在培养苗子的。我在其中学了几年，受这些名家指点迷津，茅塞顿开，在用笔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算现在，也忘不了那些老师对我的教诲啊！

张：1974年时，先生以一本《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风靡大江南北，短短几年发行了几百万册。据说现在有很多前来求买墨迹的人都说当年是因为这本字帖认识了周先生，喜欢上了周先生的字。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正是这本字帖奠定了您在当代书法界的卓著声誉呢？

周：其实，我出这本字帖应该说是遇到了好的机遇。那时是文革，家里生活一落千丈，母亲患了痴呆，父亲也体弱多病，书法班也停了课，真的是苦恼啊。后来偶然找到了一箱未被抄走的字帖，欣喜万分，就又提起笔来开始自己练。到了1974年，出版社找我，让我写《鲁迅诗歌选》。一开始我不敢答应，一来太年轻，二来要写简体字，适应不了。后来领导做工作，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当然，发行情况之好是绝对没有想到的。我感觉还是因为当时传统法帖被视为封建糟粕，禁止出版。其次，老一辈的著名书法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不准写了。我只是碰巧遇上了这么好的机遇而已。

张：但机遇总是给有实力、有准备的人的，先生不必自谦。后来，先生进入了画院书法组，成了一名专业书法家，这其中对您又有何教益？

周：我是1977年由翁先生（翁闾运——作者注）引荐进入画院的。翁先生长久以来都是我的恩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是我这一生中的贵人，我很敬重他。

进入书法组，就意味着我不用再为家计而四处奔波了。刚才我说过，家里经过公私合营和文革，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另外，画院有许多在当时不流于世的画册、碑帖，我就每天看啊看，临啊临，从上班一直到下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吸收了很多北碑的东西，感受到了书法的乐趣。

张：有人说您的字是“帖形碑质”，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时就是肇端吧。

周：大概是吧（笑）。

张：1980年，先生首访日本，此后又去过两次，还在日本领事馆教书多年，应

该说，先生和日本书法很有缘啊？

周：日本书法这二三十年间进步很快，也积极向外交流。第一次去日本就是北陆书道院邀请的，去了一周，发现了许多值得借鉴学习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的群众书法和女性书法的地位非常高。但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现在有些人过于自轻自贱也不好，毕竟日本书法的本源还是在中国。

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您被选为上海市书协主席。先生曾说过“只要是有利于上海书坛发展的，我就会坚持”。近代上海出现了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邓散木、白蕉等这样的书法界翘楚，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河南、江苏、山东等兄弟省市书法水平突飞猛进，上海在书法界的地位不升反降。因此当您接手上海书协主席时就说有人说是个烫手山芋，也有人说先生这样一个行动不便之人怎么领导书协这一大摊子。总之，流言蜚语挺多的。去年年底，书协已经启动了换届选举，您即将卸任书协主席的职位，能否谈谈您主政上海书坛十一年以来的所感所思？

周：但求无愧于心吧！我当时觉得，上海书坛不景气的确是事实，与我们的城市地位也极其不相称，没什么好掩盖的。但上海书坛自七十年代起首先崛起，以星星之火燎原，基础还是有的，关键是重视不够，没有形之于系统的成果而已。于是，我们新一届书协领导班子就统一了思想，制定好了计划，决定加强书协的功能，发挥它的主导作用。

张：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周：具体措施就是先将上海的作者特别是中青年书法家“推出去”。上海作者好像相对“青涩”，不大会自我推荐，这与上海人的性格有关吧，而书协就应该为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叫卖呵。

张：叫卖的确是必要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始终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迎接多元化文明的冲击，在接纳中取其精华为己所用，逐渐形成了现在海纳百川的商业和文化气息。但上海书坛却闭门修炼多年，缺少和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导致了兄弟省市的同仁对我们的不了解，这是多年来的不重视累积起来的后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07年上海市书协举办了“海派书法晋京展”，其影响力至今让海上书人津津乐道，您怎么看？

周：对，你说得没错。“海派书法晋京展”我们酝酿已久，从构思到实行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出乎意料的是，投稿人数很多，可见不是上海书坛沉寂已久，而

是缺少“喧闹”的舞台。我感觉“海派晋京展”实质上就是一根绳，将上海书坛的作者和广大书法爱好者间原本若即若离的关系拧成了合力。

张：既然是“海派书法晋京展”，就不得不提到“海派”二字，尤其是赴展的地域是长久以来和“海派”概念相互对立已久的“京派”发源地北京。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论述过“海派”和“京派”对立之事实，分析了成因。时至今日，您认为这种对立还存在吗，对于海派的概念您又是怎样认识的？

周：说不存在这种对立肯定是假的，但是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弥合、逐渐消融。北京长久以来就是我国的首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没有很强的商业气息，因而才有了当时的“海派”在“京派”眼中是低落一等的这种说法。

反观上海，能从一座渔家小镇发展为远东商业和文化中心，依靠的就是强大的商业力量的扶持。于是，被“京派”称为“崇洋心理”、“奢浮风气”、“市侩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若单论书法和绘画，“海派”确实是当时的奇葩，甚至是一枝独秀。一大批江浙士绅、逊清遗老的到来，对“海派”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次“海派书法晋京展”是上海书协四十四年来首次踏足京城，就是要首先做个表率，愿意和各省市的书法协会精诚合作，共弃前嫌，加强交流。

张：在主盟上海书协期间，我注意到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诸于青少年的书法培养和人才挖掘上，总是亲临现场为青少年书法爱好者示范和颁奖，究其原因何在？

周：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说的。2008年，我去看了“文汇青少年书法篆刻大赛”，让我大吃一惊呵！那次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四千多名“小书法家”的参与，年龄最大的也就18岁，最小的仅5岁，写出来的作品却老成得很。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较之一些中青年书法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我们青少年的书法水平相当高。

曾经我很担忧青少年书法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电脑铺天盖地的时代，太多的青少年在“敲键”中学习汉字的“书写”。但近年来的青少年书法篆刻大赛总体上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给了我继续发展青少年书法事业的动力。从字里行间，从稚嫩、纯真的线条和天趣盎然的字形安排上，我感觉这些小书法家有一种天真和质朴的童心，撼动着每个评委的心。

张：上海青少年书法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在全国性的青少年书法比赛中，上海参赛者的获奖率和入展率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上海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戴小京曾在采访中举例——“高野山”奖是一个日本的书道大奖，每年一次，一连举办了十多年。中国青少年参赛者每次有一百人入围，上海就占十名，而且常常将一等奖收入囊中。至于我国举办的各项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中，上海获大奖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那难道上海青少年书法的发展就不存在不足和缺陷吗，和其他兄弟省市比较，就没有提升改进的空间了吗，作为书协主席是否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周：其实，北方和中原一些省市的小作者水平非常高，他们中习碑的较多，作品质朴古拙，气局较大，虽稚嫩一些，但天趣盎然，少了一份“小人大人腔”的做作。我的理解这可能是他们的老师以汉隶、魏碑为学生的学书范本，我以为这是很值得上海书法界思考的问题。另外，我们发现上海地区应征来稿的书风气比较“脸熟”，显然是因为与赛者的字里行间中有指导老师的“影子”。这种一味模仿老师的风格，会使小孩过早被定型，对青少年以后书法的培养和发展危害极大。

张：说到青少年的书法教育，让我联想到了一件事。前年，赵丽宏先生提交了一份《建议将中国书法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建议由政府出面，将中国书法艺术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说提交前征询了您的意见，先生还特地写了文章《由“申遗”想到书法教育》以示声援，对中国书法教育的认识侃侃而谈。前些日子，中国书法终于申遗成功，同时将青少年书法教育纳入到中小学日常教学的轨道中。

周：对，这件事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当李静来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很兴奋。记得奥运会开幕式时以巨大的手卷形式展开，“笔、墨、纸、印、简牍、汉字”诸多中国书法元素渐次出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一刻，使我们的内心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又一次引发我们对汉字文化、对书法的思考。在申遗问题上，我们缘何总是比韩国人“慢半拍”？也许是由于我们对文化保护向来不够重视，韩国人正是瞄准了这一点，抢先一步把本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被韩国人所熟悉和应用的部分拿去申遗。

就书法教育而言，在最近几十年里，大多数地方和学校，因为应试教育的影响，基本上把书法教育放弃了。电脑的普及和无纸化办公的推行，使许多年轻人不会用毛笔写字倒也罢了，用硬笔写汉字也有了障碍，错别字连连。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担忧。

而同为汉字文化圈的邻国情况又是如何呢？就拿日本来说，日本的中小学普遍开设书法课，从小学到初高中都将书法教育作为必修课。不少日本人在正规、庄重

的场合下，以用毛笔签名为有修养的表现。再说韩国，规定学生应该掌握的汉字达数千字，而且在家庭重大活动场合有用毛笔字书写的惯例。

相比邻国，对照我们的现状，怎不使人担忧呢？我认为现在中小学恢复开设毛笔书法课是很有必要的，每周至少开设一堂课，不搞一刀切。另外可以举办各种书法比赛，引导中小学生广泛参与，培育他们学习书法艺术的兴趣和热情。

张：刚才先生说一些青少年的书法水平比之成年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想到沪上中青年书法家青黄不接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周：这里的因素很多。首先是上海人的性格使然，上海人理性而现实，做事容易瞻前顾后，想得比较多。其次，高考指挥棒使然。一些颇有才气的小朋友受到学业的压力，逐渐放弃了书法的练习，有些还出了国，也就荒废了这方面的才能。等过了高考后再想重拾毛笔，就来不及了。第三，后备人才欠缺。这和上海的人口基数也有一定的关系，两千多万人口，比起书法大省河南接近一亿的人口，江苏七千多万人口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河南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河南的洛阳、郑州、开封等地学习书法的人俯拾皆是，后备人才层出不穷。第四，上海经济发达，商业气息很重。太多孩子沉迷于文娱诱惑中，无暇陶冶书法修养。这些都是导致上海中青年书法家水平提不上来的原因。

张：好像书协也在中青年书法家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诸如“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上海市青年书法篆刻展”、“中青年书法创作骨干西部采风”以及和各省市的联展等，这些活动的顺利举办是否也说明了书协对中青年书法家的重视？

周：当然。中青年往往是书法家成熟期的开始，是书法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段走上专业书法家道路的。现在的上海中青年书法家有很多胜过我们这辈人的地方，比如他们对书法的观念有所提升。我们过去是“死临帖”，临得越像越好，等到想要创作了，就没了方向，这就是所谓的“出帖”，这道槛是很难跨过去的。但他们在临帖的时候，就多了些创新的意思。他们现在的学习条件也更好，眼界开阔，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学习资料，眼界往往会影响艺术创作的格调和胆魄。我看他们的作品有的在用笔、格局、气局，甚至不输给如今在拍卖会上经常看到的一些民国时代的名家作品。

同时，一些外来的中青年书法家也给上海书法队伍增色不少。我们上海书协也乐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这些来自兄弟省市的艺术同道。

张：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术，源于中国，属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最具代表性

的元素，巍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没有哪个国家的书写文化能与它媲美。先生能不能谈谈对书法这门艺术的理解？

周：中国书法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结晶，是华夏儿女智慧的象征，它因为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能长存至今。

你想啊，寥寥的几笔线条要表现出那么多千变万化的情感谈何容易啊，西方的油画可以用色彩、用笔触，书法可以吗？一笔到位呵。所以说，书法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结绳记事、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再由篆到隶、草、行楷，各种形体逐渐演变而成，因而我国的书法才可以分门别类，其他国家的文字可以吗？

张：先生的一系列著述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关于临帖的论点，但现在的社会上却存在着很多反调，先生能不能谈谈学习书法的方式方法问题，以正视听。

周：这个问题我反复强调，学书的必由之路就是临碑帖，没有争议。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有名的、有造诣的书法家，他们留下了非常多的范本，可归我们学习的借鉴。所以，我觉得学书法就是向传统学习的过程，而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临摹，临摹就是要学习古代那些书法大家留下来的经典，在学习的过程中，将古人的笔法掌握了以后慢慢变成我们自己的，然后把学到的东西潜移默化到我们的创作中去，那么就能把我们学习书法的水平慢慢地提高、再提高，最后创造出完美的作品来。

张：记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临帖的文章，中间讲了许多临帖的要点。

周：是有这么一篇文章，篇幅很短，主要就是为了驳斥当时社会上反对临帖要临得像的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张：先生在书坛活跃了四十多年了，并且个人的风格很强烈。近年来也常听得有人说先生不创新、固步自封之类的话。不客气的人还批评先生的字已经过时了，流于俗套等等。不知先生自己怎么看？

周：（笑）这个问题也算困扰我很久了。简单来说，中国的书法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创新史，千百年来能在历朝历代占一席之地的大书家，没有一位不是创新的典范。石涛有句很有名的话“笔墨当随时代”，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但什么是创新？我认为个性强烈的艺术家，风格的形成一定会早于一般人，用心搞艺术的人必然会把他的综合素质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形成其特殊的风格。但风格会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不同于戏剧中的“变脸”，可以在瞬间完成。

总体来说书法在进步，也许我的观念真得落后了，但我的潜意识里是不甘落后的。不过，每个人都会有因各人的理念之差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会尽力并尝试去改进我所能意识到的那一部分。至于雅与俗的这个问题，它的界限难以准确划分。我个人认为书法的本质是强调艺术性，但毕竟也因其具有实用成分而不能一味地雅而不俗，只要俗不伤雅、雅俗共赏就能被大众所接受。“唯美”与“宁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我的口味，我的书法以及行为处事，基本上是偏向儒家的“中庸之道”的。

张：听闻先生是一个京剧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周：个人兴趣吧，有时间会和陈佩秋先生等一些朋友一起去戏院看看戏。国粹京剧的艺术熏陶，对我们搞书法的人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嘛。书法家要多汲取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嘛。

张：周先生的兴趣是不是也受了您父亲的影响，听说他是一个很善于玩的人？

周：对，家父兴趣很广，很爱玩，我这里有本相册，都是他四处游历时拍的。小时候我也是调皮捣蛋得很，闯过不少祸。至于现在除了京剧外，马戏、杂技、评弹、电影、连续剧啊什么的我都喜欢，什么《蜗居》、周立波的表演我都看。旅游也算，就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张：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的成功是偶然的吗？

周：还是靠勤奋和努力吧。有因必有果！

张：听了先生今天的一席话，感觉老前辈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与感悟的。再次感谢周先生今天不辞辛劳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周：谢谢。

采访结束，定睛看表，已经是晚上10点，采访足足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周先生依然热情地到门口送别，却依稀感觉她言语和行动上的疲惫，心中不禁有些后悔。在采访中，先生表现得神采飞扬，激情四溢，言无不尽，看得出对于这次采访和本书的出版是非常重视的，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年过七十、身患残疾的老人。

先生在整个采访中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许多书法界存在的问题，介绍



与翰墨同乐

了自己的书法人生，其饱含哲学性思维的话语让我获益匪浅，内心受到了很大触动和启发：先生不知“创新”，也无意“流行”，这种不期而工的心态使得周先生的书法作品中始终充溢着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结合，使她的作品丰满并具有立体感。她的墨迹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跳跃腾挪的节律、出乎常人意料造型，均使人过目不忘。她的笔下所表现出的粗重与空灵、厚实与淡雅，无不说明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入了自己的创作境界，纵横捭阖。

确是书坛奇女子！